

高教探索

Higher Education Exploration

2006年第3期

论大学文化的特征、嬗变与功能

刘 晖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作为相对独立的、自变量的大学文化的历史嬗变和外在功能。大学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与社会主流文化总是保持着一种必要的张力，时而贴近社会、引领文化，时而超然物外、特立独行。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大学文化日渐走入社会中心，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整合功能日益凸显。另一方面，作为非独立的、因变量的大学文化又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作用下的历史产物。

关键词：大学文化；历史嬗变；文化整合

一、大学文化的内涵、结构和特征

1. 大学文化的内涵

大学是最长寿的文化机构。据拉克克统计：西方世界在1520年以前建立的大约75个公共机构仍旧以可辨认的形式存在，有着类似的功能和未中断的历史，其中61个是大学。^[1] 大学文化就是这些延续至今的林林总总大学的存在方式。她具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大学的文化生态，与校园文化含义相近，表征着大学组织来自内部的对师生发挥着潜移默化作用的文化存在；二是指大学的文化力量，表征着大学组织对外部社会发挥的文化影响和文化整合功能的文化存在。大学文化属于亚文化，是历史积淀下来的、为大学组织及其成员认同的大学组织的存在（生存）方式。大学是一个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调整着存在方式的文化有机体。

2. 大学文化的结构

几乎所有的文化研究者都认为文化是具有内部结构的，作为亚文化整体的大学文化也是由三个层面构成的。

(1) 物质文化。即马克思所说的“第二自然”或“人化的自然”。它是主观精神文化的外化或物化，反过来成为生长新的个体和群体精神文化的物质基础。如大学内的图书馆、博物馆、教学楼、展览馆（校史馆）、纪念物（如厦门大学校园内的萨本栋铜像）等。物质文化作为“在场”的文化总是蕴涵着或象征着某种“不在场”的理念和精神，例如萨本栋铜像作为“毁家兴学，舍身治校”精神的象征，体现了厦门大学几代学人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的奋斗精神，展示了以陈嘉庚和萨本栋为象征的大学文化传统和精神内涵。北京大学的未名湖，清华大学的“荷

塘月色”，中山大学的“永芳堂”等，也都以“在场”的物质形式蕴涵着“不在场”的文化精神。

(2) 制度文化。大学制度由教师制度、学生制度和管理制度组成。一些传统的大学制度如学院制、导师制等对学生发展构成一种制度文化的氛围，潜移默化地浸染着学生。正如加拿大幽默散文家兼大学教授斯蒂芬·利考克在《我见之牛津》里说的：“对大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他周围的生活环境。一切他真正学到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靠他自己的智力积极活动，不是作为被动的听讲者而学到的。为了进行这种积极活动，他真正最需要是跟同伴们不断地密切接触。大学生们必须生活在一起，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谈论。经验表明，他们的心灵是靠这样真正成长起来的。”他认为，牛津导师所做的就是召集少数几个学生，向他们喷烟。被系统地喷烟，喷了四年的学生，就变成了成熟的学者。一个被烟熏透的人，就能说优雅的英语，写优雅的英文，其优雅的风格是靠任何其他方法都学不到的。^[2] 重要的是，制度文化是联结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中介，以制度保证精神文化的传承和物质文化的持久。

(3) 精神文化。她是大学赖以生存的价值系统，包括大学理念、大学精神、知识信仰系统、文化价值取向等。例如从英国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到催生现代大学制度的德国“洪堡教育改革”再到美国的“威斯康星思想”，构成了西方大学的多元文化传统。精神文化在现实中还常常以“仪式”为载体来实现。仪式是文化价值的表达方式。例如通过背诵校训、咏唱校歌、举行校庆等仪式向学生传达学校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另外，大学的大师本身以及他们/她们的逸事也构成一种大学文化象征。陈平原说：

收稿日期：2006-02-23

作者简介：刘晖，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广州大学高教所所长、教授。（福建厦门/361005）

“没有长须飘拂的冯友兰，没有美学散步的宗白华，没有妙语连珠的吴组缃，没有口衔烟斗旁若无人的王瑶，未名湖肯定会显得寂寞多了。”^[3]于是留下大师们足迹和故事的未名湖因此富有了文化象征，如同清华的“荷塘月色”荡漾着朱自清的文采一样，而有别于所有其它的湖或塘。

上述三者的集合融会为大学文化的内在品质和外在文化象征、文化符号和文化力量。

3. 大学文化的特征

我们可以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阐释大学文化的特征。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研究人类社会中的行为、信仰、习惯和社会组织的学科。我们可以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考察具有900余年历史(这里我们取大学起源于中世纪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和法国巴黎的“讲学中心”的说法)的大学文化的特征。

(1) 历史性与未完成性。传承与创新是大学文化永恒的旋律。大学文化是历史的存在，她是自有大学组织开始的一种生存状态或生活方式。今天的大学文化总可以找到历史的源头，继承历史的元素，如大学组织制度、学位制度、学术信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而大学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或社会文化的一个亚文化系统，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着，通过各种形式的创新赋予大学文化新的内涵，例如她的组织形式、存在方式、管理制度、社会职能等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某些细微的或显著的变化。大学文化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除非大学消亡。

(2) 保守性与开放性。大学作为一个古老的文化机构，她拥有一种与社会主流文化或大众文化格格不入的“象牙塔”(Ivory Towers)精神，这种精神作为大学的文化遗传密码存留至今。在一些历史的变革面前，她会以特立独行的方式显示她的文化保守倾向，有时甚至成为社会改革的最后“堡垒”。惟其保守，才使高深学问薪火相传。同时，大学是知识传播与知识创新的文化机构，知识分子们常以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为己任，知识精英们常以普世关怀和社会批判为天职，彰显着大学文化的开放性甚至前卫性。惟其开放，才使大学文化引领社会进步。

(3) 国际性与本土性。大学作为特设的社会文化组织形态发轫于中世纪的欧洲，现代大学以洪堡19世纪初创立的柏林大学为开端，一直发展成为被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称为“多元化巨型大学”的组织形态，其内在文化基因是一脉相传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大学文化皆具有一般的、大学所共有的存在方式和文化特质，例如大学的组织方式、大学精神、价值追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等，即大学文化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性。同时，任何国家和区域的大学文化都不是抽象的，她总是植根于某个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不同程度地烙上本土文化的印记。

二、大学文化社会角色的嬗变

研究大学文化的嬗变，大体可以从两个角度：一是将

大学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或说明性的变量，即大学文化作为影响社会发展的自变量；二是将大学文化作为非独立的附属性的变量，即大学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因变量。笔者选取的是第一个角度，即从大学文化作为独立因素对外部社会(政治、经济、市民等现实生活)的影响方式和程度着眼，来观察大学文化社会角色的演变历程。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们大致可以将总体意义上的大学文化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象牙塔(Ivory Towers)时期、世俗化(Mundanization)时期和中心化(Centralization)时期，以下分别述之。

1. 象牙塔(Ivory Towers)时期(大约12世纪——16世纪)。一般来说将大学比喻为象牙塔，特指囿于神学天地、以研究经院哲学为主的中世纪大学校园，后来泛指脱离世俗社会生活的大学。象牙塔时期的大学文化表现为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知识分子文化，其对社会的影响局限于某些特定的社会领域。在这一时期，仅仅存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几十所大学，这些大学表现出以下共同背景：

——欧洲中世纪期间，学问掌握在天主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手里，他们主要从事于用古希腊哲学为基督教义做注脚，称之为经院哲学。欧洲乃至世界最早的一批大学大多发端于这一时期。

——中世纪为了培养牧师、僧侣以及医生和律师，让他们在教堂和修道学校结业后再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而创办了“大学”。大学成为讲授经院哲学的主要场所，如当时欧洲大陆最主要的讲学中心——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和法国巴黎，诞生了世界最早在大学。

——所有大学教员都必须是天主教会的某种神职人员，多数学生的求学目的也是谋取神职或在教会里得到晋升。现在大学师生穿的各种学袍，就是承袭了当时各级神职人员所穿的不同教袍。

——学院(College)即是牛津和剑桥的建于中世纪、由土黄色大石头堆砌成的、哥特式风格的建筑群构成的一座座四方院，象征着特权、封闭、清高，甚至与世隔绝。

因此，象牙塔时期的大学文化主要特征是以附庸君主和教会而获取的特权性、以研究经院哲学为主的狭隘性、以宗教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封闭性。尽管如此，这时的大学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在推动社会的知识累积(如哲学、医学、神学、法学)、完善独立(如大学自治传统)的高深知识生产与传播机制和培养高级知识分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世俗化(Mundanization)时期(大约16世纪——20世纪上半叶)。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宗教改革的推进、文艺复兴的深入和工业化的进程，大学文化相伴地发生着悄然的变化，大学由为宗教(神学)服务为中心向同时兼顾为市民和社会的服务转变。此时大学的学问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相比，逐步走向世俗和民间，与之相应的大学文化也开始转向，由面向神学的单一维度变为神、人、社会三个维度，政治、经济、科技、市民生活等世俗世界的

事情越来越多地进入大学知识分子的视野。我们仅以英国为背景对这一时期的大学文化加以说明。^[4]

——15世纪开始至整个16世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作为知识、思想和学术中心，在英国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6世纪，世俗的英语文学开始兴起，牛桥(Oxbridge)出现了一批所谓的“大学才子”(University Wits)。他们创作的诗歌、散文、戏剧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甚至对文艺复兴大师莎士比亚的早期作品都产生过影响。

——1535年亨利八世的命令以及其后解散所有天主教修道院的行动，对于经院哲学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从此牛津大学的主课就改为古典学(Classics)，即人文学科(Literae Humaniores)，古希腊罗马的文史哲，通称大学科(Greats)。神学不再特别重要，而逐渐变为许多平等的学科之一。

——17世纪的内战(1642-1651年)至18世纪工业革命(始于1780年)，出身于剑桥和牛津的牛顿、达尔文和亚当·斯密、杰里米·边沁为科学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大学的知识分子也作为“托利党”或“辉格党”的支持者而空前广泛地参与政治文化生活。

世俗化在大学的表现为近代化和现代化，如非宗教化、非贵族化、平等的考试、学科范围的扩大与交叉、大学资金筹措的变革、男女平等、强调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国际化、环境和设备的改变等等，这些大学文化理念一经形成又深刻影响着世俗社会的文化走向。

3. 中心化(Centralization)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二战”之后，在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得到空前发展。随着“知识爆炸”和“知识经济”的出现，大学由社会边缘进入社会中心，展示了空前的文化力量。

——事实上，世俗化的过程即是大学向社会中心靠拢的过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和欧洲的高等教育就开始显露中心化的端倪。布鲁贝克描述这种变化时说：“高等教育从美国生活的外围变为中心的发展已经开始了。在大学与周围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中，这一重大变革不仅受到大学内部的推动，而且也受到大学外部的推动……随着20世纪的进展，越来越多的人谈到大学实际提供服务的问题。大学越来越经常地被喻为‘服务站’。不仅如此，在政府和企业的规划中，大学也名列前茅。”^[5]

——大学在推动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中的作用日趋增强。大学现在“不仅是美国教育的中心，而且是美国生活的中心。它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重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它是新思想的源泉、倡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6]。在大学走向社会中心的进程表上，20多年前美国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目前的情况。

——潘懋元先生明确提出，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走

进经济社会的中心将是历史的必然，大学成为经济社会的中心也是高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在论述进入社会中心的大学使命时认为：大学应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库；大学应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知识库；大学应成为知识产业的孵化器；大学应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库。^[7]

中心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密切相关，可以说“大众化”使大学与各行各业、千家万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使大学文化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空前。大学成为一种力量强大、影响广泛、参与人数众多的社会文化机构。

三、大学文化的整合功能

所谓文化整合功能，是指大学文化作为独立的或说明性的变量，即自变量，在社会不同文化交流和冲突过程中发挥的调节、融合、吸收的作用。种种迹象表明，大学的文化整合功能正日益彰显。

1. 整合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功能

在中国，大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因为“从根本上讲，大学是一种西方式的机构，是在十八、十九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而被引向了地球上的绝大部分地方。在某些情况下，大学是由殖民统治者或传教士创办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由从未被殖民化的现代化社会——诸如日本、中国及其台湾——所自行采用的”^[8]。在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变革时代，社会常常面对新旧文化之间、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中国的清末民初，一直存在着“闭关自守”还是“中体西用”抑或“全盘西化”的争论。大学在论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社会文化转型中的主力。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本身是新旧文化中西文化交融的前沿，李大钊、陈独秀、辜鸿铭、胡适等各种文化力量或文化信仰的代表，对文化的走向发挥了历史性的影响，北京大学因此也成为启动中国现代文化转向的“新文化运动”的滥觞。最近20余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进程中，作为亚文化的大学文化也积极影响着社会主义文化，大学知识分子更是以空前的力量参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大学文化在促进文化的调节与融合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潮”中，大学知识分子对西学的翻译、评介、传播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的一次次影响深远的辩论，为新时期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近年知识界有关“新儒学”、“新保守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现代派”和各种“后现代”的讨论中，大学的力量是举足轻重的。回顾20世纪百年文化变迁，大学以其丰厚的文化资源、强大的文化动力在推进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塑造着现代中国文化的形态。

2. 整合和弘扬先进文化理念的功能

大学文化的开放性使大学成为先进文化理念的桥头堡，在吸收和弘扬先进文化理念方面总是走在社会的前列。大学常常引领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北京大学高擎“民主”与“科学”、身体力行“独立”与“自由”的传统

便是明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大学”条目的最后一句话说：“大学扩大了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使人们能更加懂得生活，更会享受生活。”例如可持续发展理念首先为大学学者所认识、推崇和传播，并影响政府成为政府间的国际公约。又如德里克·博克谈到的：哈佛大学的学生团体要求学校管理部门取消同伊拉克达成的关于建立一个科学学院的协议；有的组织则要求大学联合抵制公司经营非工会工人生产的生菜和向第三世界倾销不合格产品的行为；有的组织要求没收在南非做生意的美国公司的所有股票（因为为白人种族政府服务——引者注）。^[9]另外，大学在“反战”（如越南战争、前南斯拉夫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反独裁（如南韩全斗焕集团）、反歧视（性别、种族、阶级、宗教信仰等）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大学生运动”成为反对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男女不平等的急先锋。总之，大学文化的信仰或价值观（诸如增进人类福利、社会公正、种族平等、机会均等、环境保护等），逐步引导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使其变为常识或普世伦理。

3. 对城市（社区）文化的培育功能

大学对城市（社区）的文化养育与城市对大学的资源支撑构成了许多发展中城市的共性。大学对城市文化的培育、积累和创新发挥着日益重要的职能。博克说：“无论在城市还是乡镇，大学的文化、反世俗陈规的生活方式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常常成为刺激周边社区的载体，同时也是他们赖以骄傲的源泉。”^[10]大学甚至成为一个现代城市的文化核心和城市名片。大学正逐步成为城市（社区）公民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日趋开放的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学术论坛、科普讲座等作为共享的社会文化资源）；大学通过大众传媒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重要角色之一，越来越多的学者或大学生成为媒体的节目主持人、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宣传各种新观念新思潮，引领城市的文化走向；大学借助夜大、函大、网大以及林林总总的培训班等方式，正在成为学习型社会中市民“终身教育”或“终身学习”的中心；大学还在城市发展政策咨询、改善城市形象、增加城市魅力、提升城市竞争力方面释放着自己的文化力量，对于城市文化的改造与提升功不可没。事实上，大学业已成为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催生力量。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心城市要想真正成为当地科学技术文化中心，没有一所大学是不可思议的，没有这样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都将受到制约。着眼于科教兴市与社会现代化，是否可以这样说：大学的建成的确是个象征，它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中心城市与社会形态的最终确立。”^[11]

4. 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批判功能

大学文化的保守性与开放性表明：大学既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守望者，又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批判者。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特立独行、言说真理；不趋炎附势、拾人牙慧，而挑战权威、批判现实，是大学的基本价值追求。以

北京大学为例，人们至今奉为圭臬的是蔡元培主政北大时立下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是北大所以能够主导“新文化运动”和影响20世纪中国主流文化进程的思想根源。再看牛津大学，在14世纪，牛津大学学者中间兴起了批判之风，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教皇的权力表示怀疑。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约翰·威克利夫（1330?—1384）。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生，曾任贝利奥尔学院院长，于1372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但此后他思想激变，对罗马教皇的权力提出挑战，主张政教分离，认为教皇也应受制于民法。他组织并参加了《圣经》的英译工作，完成了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英译本，其目的在于使英国人民得以自己直接阅读和解释这部基督教的经书。他还公然否认神甫执行的天主教仪式能使葡萄酒和面饼化为耶稣的血与肉。他被宗教法庭审判、被驱逐出牛津、尸体被挖出掷入河里……然而，威克利夫和他的追随者实际开启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先声。^[12]以大学学者为代表的大学文化群体对社会的批判是社会主义文化进步的动力，是文明进步的福祉！

综观历史，大学文化的存在状态经历了从象牙塔到社会中心的过程，其中有一个信念是一以贯之的，即陈寅恪先生表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它是大学文化价值观的内核，是最重要的、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的。^[13]另一方面，作为非独立的、因变量的大学文化又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作用下的历史产物，这需要另一篇文章来讨论了。

参考文献：

- [1][美] 克拉克·克尔著.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 王承绪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51.
- [2][4][12] 裘克安. 牛津大学.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6.
- [3] 陈平原. 中国大学十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7.
- [5][6][美] 约翰·S·布鲁贝克著. 高等教育哲学. 第3版. 王承绪等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17, 21.
- [7] 潘懋元. 走向社会中心的大学需要建设现代制度. 现代大学教育, 2001 (1).
- [8][加拿大] 露丝·海霍. 大学与“文化冲突”. 比较教育研究, 1996 (3).
- [9][10][美] 德里克·博克著. 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 徐小洲等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7-8, 2006.
- [11] 秦国柱. “大学”之名与中心城市新办院校的发展. 惠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6 (3).
- [13] 杨向奎等. 百年学案.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3. 385.